

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

李倩文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合作以后,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统一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长驱北进,势如破竹,出广东,下湖南,八月底九月初向武汉三镇挺进。六日克汉阳,七日解放汉口,又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经历了攻城、围城到发动总攻,历时四十天,终于在十月十日攻下武昌,取得了解放武汉三镇的巨大胜利。这一页用鲜血写下的光辉历史,早已彪炳史册。唯其中有些问题,由于史料记载不一,反映在一些文章和高等学校党史以及现代史教材中,提法也不尽一致。爰就已发现的问题,作一初步考证。

一

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黄昏,北伐军第四、七两军主力到达武昌,即开始发动对武昌的攻城战。但在攻城的次数上,记载却不一致。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见于《李宗仁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所记,从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五日凌晨,五天时间,先后三次发动对武昌的进攻:第一次是八月三十一日黄昏到九月一日之间;第二次是九月三日凌晨;第三次是九月五晨开始。持“三次论”者,除《回忆录》外,还有张祥生所著《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1928年9月《东方杂志》第十五卷)。

一见于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战报——《武昌之战》(以下简称《武昌之战》)。《武昌之战》将九月三日这次攻城作为首战,九月五日的一次战斗列入第二次,而没有涉及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之间的一次战斗。持“二次论”者,除《武昌之战》外,还有苏联Б.Г.萨波什尼柯夫的《1924—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史略)》。一般教材和文章多持此说。

持不同看法的双方,一是当时战争的指挥者李宗仁,一则出自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战报,其可靠程度都相当大。因此对互相对立的两种意见不宜轻率肯定或否定,而应加以认真考证。我认为要搞清这一问题,关键在于首先要考证清楚到底有无《回忆录》中所载的第一次战斗。其次,如果确实存在有这一次战斗,那末如何解释《武昌之战》中将九月三日的战斗列为第一次战斗,就是另一关键问题了。至于九月五日的一次战斗,因史料无分歧,可排除于考证之外。

关于是否有过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之间的一次战斗,《回忆录》是肯定的。“八月三十一日,四、七两军主力抵达武昌城下,我拟乘敌军喘息未定,一举而下武昌。因于四、七两军到达后,立即下令爬城。……而敌人守城部队似已早有准备。城上灯炬通明,使爬城我军毫无隐蔽,一接近城垣,城上机关枪手榴弹便一时俱发。我官兵前有坚壁,后有城壕,在敌人机枪喷射之下,伤亡极大,于是我军第一次攻城,无功而罢”。“九月一日,四、七两军已全部抵达城下。……我军乃重新部署,准备作第二次攻城”。上述记载有时间、地点、战斗

进行情况以及战斗结局。如属误记，不会如此确凿具体。

此外，持“三次论”者张梓生文中有一段记载，亦可资印证：“初，革命军进迫武昌时，吴佩孚突令所部放弃洪山之险，待革命军进占以攻城，则由城内蛇山炮台及城上布置之枪炮，突然猛烈射击，死伤革命军极多。然彼以别队乘势猛夺洪山，则革命军死守不退。革命军卒因此立定攻城之根据”。郭沫若所著《革命春秋》“北伐途次”部分，对四、七两军初抵武昌时的情况，亦有零星描述，从中不难看出蛛丝马迹。郭沫若九月一日清晨由纸坊抵达武昌前沿阵地，对当日战斗情况有以下断续的描述：“第三师的张发奎已经先到洪山，由洪山高处炮击宾阳门一带。停在铁路沿线的队伍，进攻中和门和保安门。陈铭枢的队伍摆在南湖一带作两方策应，目的是希望敌人出城来应战”；“洪山方面有炮声，似乎我们的队伍也在应战，在铁路沿线的左翼军采取散兵线，要开始进攻了”；北伐军“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没有遮拦的地方，看见武昌城廓了，那连接着中和门和通湘门的城楼，在惨淡的白光中缥缈着，却没有看见一个敌人的影子。”（文中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从张、郭两文中可以肯定以下几点：（一）九月一日，四、七两军初抵武昌时，即在距武昌城外数里的洪山进行过战斗，并胜利地占领了该地；（二）依靠洪山有利地形，炮击宾阳门（今小东门一带），以配合沿铁路线前进的四、七两军向通湘门（今大东门一带）进攻；（三）北伐军且已逼近城根，致武昌各城门（宾阳门和中和门等）都收入眼底；（四）最后由于蛇山炮台及城上布置之枪炮突然猛烈射击，革命军伤亡惨重，被迫退下来。张、郭两文与《回忆录》所载，从时间、地点、战斗进程及战斗结局来看，都是吻合的。只不过张、郭两文除记述武昌城下之战之外，还记述了攻城前在离城数里的洪山所进行的战斗，对九月一日的攻城更为详尽具体。由此可见，北伐军四、七两军，进逼武昌之初，确曾发动过一次攻城战斗，已无可置疑。

既然对九月一日的攻城战是肯定的，那末，对于北伐军总司令部以九月三日的战斗作为第一次攻城战而载入《武昌之战》又将作何解释？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可从《回忆录》本身找答案：“三十一日黄昏，四、七两军主力均抵达武昌城下，我拟乘敌喘息未定一举而下武昌，因于四、七两军大部到达后，立刻下令爬城”。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一）这次战斗是李宗仁未及经过北伐军总司令部详细研究讨论，个人相机指挥的一次军事行动。这在指挥系统上来说，是允许的。因为李宗仁当时是中央军右纵队指挥，完全有权指挥所部进行战斗；（二）这次战斗是一次捕捉战机，企图出奇制胜而未列入战斗计划的一次突然袭击。因此，对于这次战斗从李宗仁写《回忆录》来说，确实是攻打武昌的初战。但从司令部写战报来说，就不能作为一次正式的战斗而载入《武昌之战》。

此外，从《武昌之战》的记载中也可以找到答案。首先，在部署九月三日这次战斗时，由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于九月二日在殷家湾召集了七军军长李宗仁及各队官长参加的军事会议，详尽地讨论了攻城事项，并于九月二日下午在殷家湾正式发布了第一次攻城令，决定各部进攻的方位，具体规定了各部队与总司令部联系的方法。与九月一日仓促投入战斗比较，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北伐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有计划、有步骤、部署周密的一次战斗。从总司令部的战斗部署来说，这确是攻打武昌的第一仗，因此以首战而列入战报了。其次，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在发布的第一次攻城令中，对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军第十师、十二师均分配了具体进攻的地点，唯独对于李宗仁所指挥的第七军，没有分配具体任务，只在备注栏内提出：“第七军的一部分将在吉意门、望山门附近进攻。他们在我们军队进攻前就先开火”。这就说明北伐军总司令部对李宗仁所部先期投入战斗是知道的，但并未视为首战，而

只是作为九月三日的战斗的前哨战，是九月三日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攻城的次数上，“两次论”和“三次论”都与史实相符，没有相悖违的地方。其所以出现不同结论，只是记史者的双方角度不同，因而持论各异。但作为史籍阐述这段历史时，似应以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战报”作依据为宜。

二

“武昌战役”的战斗情况，有的党史教材在记述中，也有不尽符合史实之处。其中如胡华同志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九月版）所记关于北伐军攻打武昌的情况，就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讲义》谈到北伐军攻打武昌的情况时说：“北伐军围攻武昌月余，到十月十日发动总攻，独立团搭云梯冒炮火奋勇爬城墙，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在指挥攻城时光荣牺牲，独立团终于率先登城，武昌最后被攻下”。这一段记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关于独立团爬城及一营营长曹渊牺牲的时间问题。据《武昌之战》及一九二六年九月九日叶挺的《参战报告》所载，均不是十月十日而是九月五日。《参战报告》云：“九月五日独立团奉令为攻城部队，以第一营为奋勇队，拟以竹梯攀登城垣。天未明，全营迫近城下，受敌猛烈射击，加之手榴弹及大炮之威力，不及二十分钟，全营几为敌覆灭，第二营加上亦受大害，至天明乃不得不撤退。此役伤营长一员……现城尚未攻破，阵亡官兵，均曝尸城下，无法收取，亦云惨矣”。《武昌之战》除转述叶挺关于攻城情况外，特别指出叶军被打死的有七十八人，第一营营长曹渊（《武昌之战》写成谐音赵勇）和三连连长被打死。从此以后，由于强攻多次失利，北伐军乃改变作战计划，由攻城改为围城，至十月十日解放武昌为止，再没有采用过爬城战。由此可知，叶挺独立团奋勇爬城及曹渊牺牲时间均应是九月五日。《讲义》写成十月十日值得商榷。

其次，《讲义》不仅将独立团九月五日爬城之举，移用于十月十日对武昌的总攻中，而且认为武昌是叶部独立团搭云梯冒炮火，率先登城攻下的，也不符合史实。武昌被围期间，敌粮尽援绝，无法坚守。再加上中共湖北地方党组织和北伐军总司令部曾利用各种统战关系，策动部分武昌守敌或从内部策应，或起义投诚。当时已与北伐军建立联系的有敌湘鄂边防军第五路总司令宋大霈的副官陈荣城；敌混成旅旅长贺对庭；敌三师师长守城副司令吴俊卿等人。因此，在十月初发动总攻击时，已不需要初攻武昌期间的那种强攻。据长沙《大公报》十月十二日登载的武昌前线捷电，有这样一些记载：“因城内残敌，以粮尽弹缺，外援失望”，北伐军乃乘机于“九日六举总攻”，敌“第三师缴械投诚”，“敌于灰（10）日拂晓由沙湖平湖两门突城冲出”，“十日三时三十分，我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第八军陶旅、李旅，经由中和门、保安西门入武昌城”，“我刘师李、周二团，均陆续由武昌宾阳门进城”，“十日午前三时三十分攻入城内，围攻四十天之武昌至此完全为我军克服矣”。综上所述，到了十月十日，武昌城各门守敌，早已军心涣散，失去斗志，有的缴械投诚，有的打开城门，夺路逃命，北伐军几乎不攻而下武昌，根本用不着搭云梯冒炮火越城而进了。

三

关于汉口一役，也有可资商榷的地方。如魏宏远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月版）（以下简称《史稿》）记述北伐军向武汉三镇进军时云：“九月一日，北伐军又兵分三路向武汉三镇进军。左路以第八军为主力攻汉阳；右路以第七军攻汉口；中

路以第四军攻武昌。左路军占领汉阳附近之黑山，汉阳炼钢厂工人举行罢工相配合，敌刘佐龙部宣布起义，六日汉阳克服。七日右路军在汉口工人配合下占领了汉口”。认为攻取汉口的部队是北伐军第七军者，除《史稿》外，还有张梓生亦持此说：“国民革命军对武汉战事分三路进行，中路由李宗仁亲督队攻武昌；左翼第八军及夏斗寅部由上游渡江攻汉阳；右翼第七军之一部迂回以攻汉口”。但张说与《史稿》仍有不同之处：张只说七军之一部而不是全部，且其主帅李宗仁仍在武昌督战；张说的“国民革命军对武汉战事分三路进行”，其中“右翼第七军之一部迂回以攻汉口”，犹可视为只是北伐军的战略计划，并未成为事实。而《史稿》却说“七日右路军在汉口工人配合下占领了汉口”，断言汉口是七军攻下的，则值得商榷。

首先，根据长沙《大公报》九月份有关武汉前线消息报道，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大公报》曾多次报道唐生智所指挥的第八军何键师攻占汉口的情况，如：总司令部参谋处的报告云：“何师大部已渡过汉水，进取汉口”；唐生智报告云：“七日汉口之敌，受我压迫，纷纷向黄陂孝感方面溃退，我军正向刘家庙追击中，汉口完全为我军掌握”；“七日何师渡汉水，得到刘佐龙附义，进攻汉口”。除此之外，还报道了属八军领导的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由循礼门乘京汉车至江岸，驻扎在刘家庙湛家矶各营房”，唯独没有第七军进攻汉口的报道。第二，北伐军攻打汉口前后，《大公报》曾两次报道了七军行止。九月十日一次云：“我七军指挥部于支(4)日占鄂城”，这则报道说明汉口攻克前三日，七军还在武昌之东的鄂城。另一次则见于九月十二日《第八军第一师进攻汉阳汉口之详情》中：“我军到达大军山时，正值一、四、七军包围武昌”。这则报道是九月五日发自武昌前线，这就是说汉口攻克前二日，七军还在包围武昌，与汉口还隔有长江天险，如果进占汉口，较之八军六日攻占汉阳后，横渡汉水，乘胜进占汉口，困难要大得多。从战略上说，也不会弃八军渡汉水就近进攻汉口，而调七军涉长江远攻。此外，还可从另一则报道得到旁证。九月十一日《大公报》报道李宗仁夫人郭德洁慰劳七军伤员的消息中有“第七军此次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处……奋勇异常，因此受伤者亦较别军为多等语，也说明七军战斗任务在武昌而不在汉口。

其次，北伐军第七军是李宗仁所部，曾参加过贺胜桥、汀泗桥、武昌诸役的战斗。在《回忆录》中均有生动而具体的记载。唯独对汉口、汉阳两役，则只作聊聊数语的记载：“所幸我第八军何键、夏斗寅两师在嘉鱼渡江后，此时已迫近汉阳。九月五日，原与我通声气的刘佐龙鄂军第二师正式声明附义，加入革命，刘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之职……刘部遂于九月六日占领汉阳，七日进占汉口”。从其记载中，有值得注意者：(一)没有只言片语记载七军参加了攻打汉口的战斗，如果七军参加过战斗而且占领了汉口，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不会没有反映。(二)由于李、唐之间有矛盾，《回忆录》不愿将攻占汉口之功归之于八军，而归之于策应攻城之敌刘佐龙，但亦不得不尊重事实，对八军攻占汉阳、汉口作了曲折的反映。由此可见，即令是七军的领导人，也没有说七军参加过攻占汉口的战斗，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汉口不是七军攻下的。《史稿》断言右路第七军在汉口工人配合下占领了汉口，是值得商榷的。

由于掌握史料有限，以上管见，仍不免有错谬之处，尚希广大党史工作者予以教正。